

王安憶

王安憶是「寫實派」的擁躉，在小說的世界裡，她將「寫實」一以貫之，堅稱「只有自己經歷過的生活，才有寫作慾望」。生活中，她同樣「固執」地活在觸手可及的「現實」中，對姍姍紅的虛擬世界置若罔聞。當其他作家們紛紛加入一波又一波的微博混戰時，她至今卻仍然不會上網。「我不會上網，也不學習上網，」王安憶說，「互聯網的世界，對我完全沒有吸引力。」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
圖：受訪者提供



王安憶在泰安路。

細水長流的文學「匠人」

美學遠比風格重要

對於王安憶的風格，外界爭論頗多。有支持者褒獎，指王安憶風格之多變，令其他女作家望塵莫及；即使最為敏銳的評論家也很難把她歸為某類或某派；但也有人提出尖銳的批評，指出自《長恨歌》以後，王安憶陷入自我重複的循環中，沉迷於描寫上海小女人的生活。不過，無論外界如何評價她的「風格」，王安憶並不喜歡被「風格化」，堅持認為追求風格不應是作家的理想。

「追求美學理想遠比追求風格重要，」王安憶說，「而我的美學理想就是『寫實』。」從《小鮑莊》、《啟蒙時代》到《長恨歌》，王安憶是堅定不移的寫實派，即使是以明代為背景的《天香》，她亦認為沒有偏離「寫實」的路線。剛剛完成的中篇《翠聲喧嘩》，描寫上海當代市井生活，同樣是一部寫實小說。

王安憶是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超級書迷，不但擁有88卷阿加莎全集，更曾出了一本全面剖析偶像作品的《華麗家族》，喜愛的重要理由便是「阿加莎最生活」，「事後要細究起來，卻發現故事中的人，分明又是生活中的面目，情節也是根據日常情理，是你我他全能了解的，這些令人着迷的故事，其實是圍於現實，在生活的範圍內索取材料。」

不玩微博不上網

王安憶對現實的鍾愛，不但體現在作品當中，更貫穿於日常生活。當其他作家們熱衷於博客、微博的時候，她卻連上網都不會。「我不會上網，也不學習上網，互聯網的世界，對我完全沒有吸引力。」王安憶透露，她至今仍沿用「原始」的方式寫作——手寫，於她而言，電腦只是一個騰寫手稿的高級打字機而已。

有些作家喜歡猛寫一陣、猛歇一陣，王安憶卻是細水長流型的。她甚至自比「匠人」，寫作方式是「天長地久，天天都寫」。「寫作是一門技藝，必須拳不離手，曲不離口。」在她看來，寫作也是個技術活，往往一天不寫，就得花兩天撿起來，「或許有人會認為這樣寫作很機械，但我就喜歡這樣。」她自認為並非「快槍手」類型的作家，但由於每日筆耕不輟，作品數量積累起來倒也十分可觀。

而今不少作家已將寫作當成「玩票」，但對王安憶而言，寫作仍是天下第一重要的事。「假如有人問我為甚麼寫，我便回答：『為了生活得更好』。假如有人問我為甚麼生活，我便回答：『為了寫得更好』。」她坦言，自己特別注重與世界同齡作家的作品進行比較，比如日本作家石黑一雄，「我要看看自己和同齡人的差別在哪裡，如果我看到一個更好的小說，心情會非常複雜，覺得怎麼寫不過他；有時候又覺得，可以寫得更好。」

喜歡小說勝於劇本

王安憶筆下多是生命力極其頑強的女人，往前走，不回頭，不妥協。她是將自己的個性融入筆端嗎？「我沒有她們這樣的勇氣，」她笑言，「我在虛擬的世界中很堅強，但在現實中，我不是那麼積極的人，作家多少是有些懦弱的。」

除卻創作小說、散文，王安憶還曾操刀改編劇本，香港版舞台劇《金鎖記》就由她擔任編劇。至於未來是否有原創劇本的計劃，王安憶謙虛地表示「不太可能」，除了對戲劇創作缺乏經驗，性格亦是一大阻礙，「我做原創劇本有先天缺陷，因為我無法組織激烈的矛盾衝突，我比較溫和，我的小說也都比較含蓄，大多沒有太激烈的矛盾衝突。」王安憶說，如果有一個好的創意和故事，她更願意將此寫成小說，「我喜歡那些不言而喻的微妙處理，但這些只適合小說，舞台是赤裸裸的，需要疾風驟雨。」

文壇沒有那麼糟

近年來，坊間對文壇的各種批評聲不絕於耳，但在王安憶看來，文壇並不如外界所言那麼糟糕，「在這一點上，我特別贊同一位復旦同事所言，這個時代是一個破壞的時代，人們發現壞的東西很容易，發現好的東西卻很難。事實上，只要沉下心來認真閱讀，便會發現文壇並沒有那麼糟，中國當代也有很多好的文學作品。」

至於近來評論界將她的《天香》與曹雪芹的《紅樓夢》相提並論，王安憶對此誠惶誠恐，表示創作過程中並沒有參照《紅樓夢》，「《紅樓夢》是不可逾越的神話，雖然我很想追求，但一定追不上，所以就躲得遠遠的。」

王安憶簡介

王安憶，1954年3月生於南京，次年隨母親，也是著名作家茹志鵬移居上海，文革期間赴安徽插隊，1977年開始發表作品，現為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、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、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。1998年獲得首屆當代中國女性創作獎，2001年獲馬來西亞《星洲日報》頒為「最傑出的華文作家」，2011年獲布克國際文學獎提名。

著有長篇小說《69屆初中生》、《長恨歌》、《桃之夭夭》、《遍地英雄》、《天香》等；中篇小說《小鮑莊》、《我愛比爾》、《隱居的時代》、《月色撩人》等；另著有《王安憶短篇小說編年》、《剃度》在內的多部短篇小說集，以及《獨語》、《尋找上海》、《空間在時間裡流淌》等非虛構作品。其中，《長恨歌》榮獲「第五屆茅盾文學獎」，《天香》榮獲第四屆紅樓夢獎首獎。

採訪手記

不太熟悉王安憶的人，總覺得她頗有距離感。在公開場合，王安憶話不多，很多時候神色淡然。她顯然並不擅長人情世故，更不是那種見面三分熱，滔滔不絕的「話癆」。兩年多前，由王安憶改編的舞台劇《金鎖記》在上海公演。記者在後台逮住書七巧的扮演者焦媛，欲作採訪。彼時，王安憶正與焦媛一起，見狀連忙退到邊上，在一旁靦腆地微笑着，安靜地聽完整段採訪。再後來，上海書展期間，諾獎得主紛紛訪滬，作為上海作協主席的王安憶每每出現在活動現場，最多也只是起身示意，沒有多餘的致辭。

原本擔心約訪王安憶並不容易，未料進展卻出奇順利。王安憶語速很快，行事作風亦不拖泥帶水。頭天傍晚致電約訪，次日晚間已經如約完成。採訪時間雖然只有短短半小時，但其敏捷的思維加上飛快的語速，卻令效率加倍，有如平日一小時的採訪體量。未了向王安憶索要十張照片，她答應讓丈夫代為發送，第二日果然發現十張照片靜靜躺在郵箱當中。

王安憶形容自己是溫和的人，確實如此。她堅持自己的想法與活法，但對別人不一樣的想法與活法，也欣然接受，不願多加批判。她對人懷有善意，採訪中，有質疑、批判的觀點，她不會激烈地為自己辯駁；提及尚不成熟的後生晚輩，亦是沒有一句重話，態度謙和寬容。有時候，她敏感地意識到，某些回答可能帶有批評的意味，便會連連囑咐，千萬不要寫到報紙上。

她還是不用開會的上海作協主席，王安憶笑着透露，允許她「不用參加會議」，是當日任職的「交換條件」。這令她專心沉浸於創作世界裡，不但小說、散文連連面世，更是各類文學獎的寵兒。與世無爭、與人無爭，據說少言寡語的她，人緣不錯，這恐怕是重要的原因吧。

三個囑咐引熱議

自2004年起，王安憶就開始在復旦大學中文系授課，她很喜歡這個身份，除了能與充滿活力的年輕人在一起，在她看來，講課的過程亦是整理自己想法的契機。

王安憶凡事嚴肅認真，其對於教育的深入思考，近來還在微博引起熱議。在今年的復旦大學研究生畢業典禮上，王安憶做了一篇名為《教育的意義》的致辭，其中三個「淺顯的囑咐」，被評論界概括為「無用之用」、「過程之美」和「競爭之失」。

「首先，我建議你們不要盡想着有用，而更多地想些無用的價值，這個世界上有用的事物已經太多了，所有的因果邏輯都是循着用途連接和推動，那些邊緣的次要的性質從因果鏈上碎裂下來，被淘汰出局，生活和人生本來是瀟灑着氳氳的形狀，質地也具有彈性，如今愈來愈被過濾乾淨，因而變得光滑，堅硬，並且單一。」

「其次，我希望你們不要過於追求效率，效率總是以目的論

非典型的上海人

王安憶筆下的故事，多以上海為舞台。正因如此，無論她自己是否情願，在讀者與評論家的心目中，她已然成為繼張愛玲之後，「海派文學」的有力代言人。

「可我卻連上海話都說不好！」說到自己並不地道的上海話，王安憶有些不好意思，「我說的上海話，全都是將普通話『翻譯』過來的，是用普通話的語法說上海話。」原來，雖然自一歲就隨家人自南京搬至上海，但由於爸爸是福建人，自小王安憶家裡的「官方語言」就不是滬語，「我講上海話是半路出家，一直到小學才開始學，所以就比較蹩腳了。」

王安憶的文字，每一個毛孔都散發出上海氣息，絲絲入扣的表述觸人心弦。但她本人看起來卻是個「非典型的上海人」。除了身形高大外，行事措辭少了點海派的溫軟，倒多了幾分北派的爽快。她亦不把自己當成是「上海通」，對評論上海之類問題，避之唯恐不及，「我在上海長大，我的經驗、成長與上海息息相關，正因為如此，才很難與上海拉開距離，我眼中的上海，都是自己的經驗，我的評價不會客觀。」



王安憶和父母，她的母親茹志鵬也是中國當代著名女作家。

的，事實上，我們都是處在過程中，這大約可說是生活的本質，只是這過程愈來愈被劃分成細小短促的目的，偷竊了我們對未來的觀念。」

「第三，我勸你們不要急於加入競爭，競爭難免會將你們放置在對比之中，影響自我評定。競爭還會將你們納入所謂主流價值體系，這也會影響你們的價值觀念。而我希望你們有足夠的自信與主流體系保持理性的距離，在相對的孤立中完善自己。」

雖有網友認為，這三個囑咐「不食人間煙火」，但坊間仍然不乏擊節叫好之聲。媒體人洪晃就表示，贊同有人的

在中國的價值觀念中輸入一些MBA以外的理論。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現代文學資料與研究中心主任陳子善也表示，有人覺得王安憶的言論在現實中不可行，但他並不這麼認為，「我覺得無論社會是怎樣的一種狀況，每個人有他可以选择的底線。很多時候，可以妥協，卻不能投降。」



王安憶與嶺大學生一起上課的情形。